

# 神聖的避難

● 康正果

看過電影《巴黎聖母院》的人大概都難忘那觸目驚心的一幕：當吉普賽女郎被綁在廣場上處死的時候，鐘樓怪人夸西摩多忽然從天而降，他從刑場上把她搶走，一轉身跑入了聖母院大教堂。像在講台上公布宣言一樣，他抱持着女郎，反覆向教堂外的人群大聲呼喊：「避難！避難！」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從國王到士兵全都無可奈何，他們只得眼睜睜看着他劫了殺場，讓正待處死的吉普賽藏入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堂。這一幕情景可謂生動地體現了基督教語境中「避難」(sanctuary)一詞的含義。這裏所說的避難並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逃亡或藏匿，不是走向躲避戰亂的桃源，不是埋身隱名以抹掉追捕蹤迹的出家，它是一個越過界線的行動，是進入了世俗的權勢管不着的地方，是在上帝公開的蔭底下給塵世的法網開了一個口子。

在中國這塊缺乏神性的土地上，自古以來都是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信條辦事的，帝王的權力高於一

切，且壓倒一切，除了造反或軍事割據，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和平地保持其對抗朝廷和官府의 姿態。因此，一個犯了法的人，即使他的案子情有可原，甚或純屬冤屈，他也只能寄希望於皇上或長官的開恩，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你幾乎是無處可逃的，沒有任何一個代表正義的勢力可以公開地庇護你，法網就是天羅地網。東漢時期，有一個被通緝的黨錮人物連續地躲藏官府的追捕，他的很多親友都因為掩護他而遭到滿門犯抄的下場，他最後逃到了塞外才得以幸免。正如後來指責他的一個人所說，他的幸存簡直是用他的很多同情者的犧牲換來的。赦免只能來自那個有權懲罰的機構或個人，法律的懲處基本上只着眼於罪行的後果，而不太考慮犯罪的具體原因和過程。比如，「殺人者償命」的信條就成了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它完全否決了一個生命受到威脅的人有自衛和反抗的權利。

一神教的古代猶太則有着完全不同的傳統，由於猶太人信仰至高無上

的上帝，神廟與神職人員遂保留了與王權對立的特殊地位。有一些特殊的罪犯，如那些並非蓄意殺人的罪犯，按規定就可以在犯事之後及時地躲入某些指定的神廟裏避難。因為在猶太文化的語境中，所謂正義，並不意味着對每一件罪行都一律施罰，一個正義的執法者更應該正視有可能減輕某人罪過的特殊情況。神廟是聖域，不是藏污納垢之地，它當然不會接受犯謀殺、偷竊等罪行的人，但它庇護值得同情的逃亡者，它的神聖性顯示在它始終保護弱者和不幸者的立場上，因而包括奴隸和欠了私人債務的人，全都在它庇護的範圍之內。執法者不准直接進入神廟抓人，逃亡者在其中躲過一定的期限，好像就可以平安地回到社會上了。我們無暇在此詳敘這一過程的種種規定，需要強調的只是，人世間一旦存在了神聖的庇護空間，國家的法網就不可能一手遮天，不得為所欲為地施虐於民眾了。

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的教堂成為避難的聖域，通過維持這一古老的傳統，教會頑強地確立了它與世俗權力相對立的地位。我們同樣沒有必要在此涉及教會實施其庇護權過程中的具體是非問題，值得我們重視的只是這一對立立場的抽象意義。首先，由於教會具有得自超越的上帝的神聖性，因而使教堂這一獨特的地盤、教會這樣的團體以及其中的神職人員全都有了神聖性。在與世俗權力分庭抗禮以維護正義的問題上，這一神聖性具有承擔任何罪責的力量，它敢於染指麻煩的事務，根本不害怕因此而弄髒了自己的手。魯迅曾氣憤地慨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之所以民氣如此之孱弱，之所以根本聽

不到不同的聲音，就是因為從來不曾有一種神聖化了的力量做堅強的後盾，使個人或團體有恃無恐地挑戰王權、官府和綱常法紀之類的俗世權威。其次，賦予對抗力量以神聖性不只確立了權力的雙軌制，而且產生了二分的價值體系，即劃分了上帝和凱撒各行其道的原則，在對立中又有共享的對話，由教會與國家的對立導致了「罪犯」(criminal)與「罪人」(sinner)的同時並存。前來尋求庇護的人既是國家的罪犯，也是教會的罪人。前一種情況只強調懲罰，後一種情況則突出了一種替有罪過的人向上帝乞求憐憫的權力。通過庇護它的罪人，教會把自己的勢力擴展到了凌駕於國家之上的程度。不管這種對立在當時有多少爭權奪利的成分，神聖的庇護權畢竟顯示了教會對個人處境的關注，正因為樹立了這樣一種同情和救濟罪人的立場，才可能在來自國家的懲罰中發現其迫害的一面和不公平的成分，而受迫害者的得救才有了可靠的指望。人權的概念於是從中萌芽。但是在中國，人們自古以來只知道畏懼罪名，不管是給一個人加上古典的不忠不孝等大逆不道的罪名，還是現代的「反革命」或「反動」之類的罪名，預製的帽子一旦戴在了你的頭上，就再沒有人敢於或願意替你說話了。正如一個清代的學者所說，「以理殺人，誰其憐之！」「理」成了一個黑色的太陽，它使一切迫害合理化，也使受害者養成了逆來順受的心理。沒有任何一個國粹的宗教正視這樣的黑暗，佛教把苦難說成是這個世界的本體性的東西，道教教人如何成仙，在我們的文化中根本缺乏到另一個真實的空間去尋求庇護的動力。因此反抗總是以造反的形式在這個沒有窗戶的鐵屋中惡性地

循環，自由的新大陸都讓具有避難意識的基督徒捷足先登了。

最早移民到北美的清教徒就是為了逃避迫害而漂洋過海的。不管在新大陸的開發中有過多少掠奪和殘暴的事實，慷慨地接受避難則始終是這塊土地一個突出的本性。自由女神巨像前的銘文寫得很清楚：「你們古國的珍寶你們自己留着吧／我乞求你們送來的／只不過是些貧苦衰弱／無依落難的人罷了。」如今像中世紀那樣的教會避難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但避難的精神則在這塊本來就以其地理上的優勢提供了庇護的土地上得到了發揚光大。我們簡直無法統計，三、四百年來，由於北美的開發，多少人逃脫了他們本土的迫害、貧困和沒有出路，從地球的不同角落來到這裏尋求庇護和幸運。從二次大戰避難的猶太人到最近幾十年的各類難民，從鐵幕後的逃亡者到來自中美的偷渡者，美國政府或美國人民基本上都給予了慷慨的

庇護。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一直都是世界的公共避難所，沒有美國的存在，那些在不同的國度裏反抗專制和壓迫的鬥士就少了一條重要的後路。在所有的提供政治庇護的民主國家中，美國始終都是在態度上最少保留的一個。

說美國的態度最少保留，當然是比較而言的，其實在人滿為患的今日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和國民會毫無限度地接受外來的難民，排斥和限制已經成了難民輸入國的基本國策。很多曾經是難民而後來資格變老了的美國人現在開始反對移民之潮了，只有教會中的人還堅持把自己的良心只對着上帝，敢於超越國家、社區和私人的實際利益，去行使神聖的庇護權。世界的公共避難所只是美國這塊土地的一個方面，在庇護難民的事務上，美國政府同時又別有其唯利是圖的一面。對於政治避難者，美國政府其實是有其並不光彩的雙重標準



擱淺在美國東岸的  
金色冒險號

的。所謂的庇護自然具有很大的手段性質，比如對於來自共產專制國家的政治避難者，美國政府的態度就非常人道，而對待來自中美那些軍事獨裁國家的難民，處理的方針卻很無情。像薩爾瓦多和瓜提馬拉這樣的國家，其迫害人民的殘暴無道絕不亞於共產專制，但由於其政府既親美又反共，對於來自那一地區的難民，美國政府就採取了堵截、驅逐和遣返的嚴厲做法。他們被不加區分地稱作「經濟難民」，但他們一旦被遣送到本國政府的手中，就有受到殘殺的危險。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亞利桑那州的土孫市(Tucson)教會為首，有七萬之多的美國人為了維護個人良心的神聖性而發動了一場避難運動。他們與中美的難民無親無故，他們也知道，讓這些難民大舉入境會給他們的既得利益造成負面的影響。但他們更知道，避難的神聖性高於一切，基督徒應該超越國家和個人的利益去救濟需要幫助的人，於是他們甘冒被起訴和坐牢的危險，組織了庇護偷渡難民的地下通道，使數百萬亡命的中美人進入美國，躲過了被遣返的命運。他們的行動感人地證明，教會只有作為庇護的團體與窮苦人堅定地站在一起，才能找到它的真正意義和目的。他們呼籲一種超越了國家、種族和政治經濟利益局限的兄妹情誼，即把那些中美的難民當作他們自己的親人看待，把難民所受的迫害當成自己親人所受的迫害，把那個兒子被殺的母親視為自己的母親，把那個被強暴的姑娘視為自己的妹妹，把那個遇害的青年視為自己的弟弟。他們的行動還證明，有關人權的政治主張如果沒有同宗教的人道立場結合在一起，它所謂的人權便有一定的虛假性。對比一下教會的

避難運動，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偽善和背離人權原則的一面。

「金色冒險號」船民的遭遇則向我們提供了另一個事例，讓我們看到了美國移民政策在雙重標準上的另一表現，同時也再一次證明了避難精神在美國民間的深廣博大。這是一條滿載中國偷渡者的貨船，很難說清這些人冒險偷渡的特殊目的和具體原因。但不管怎麼說，僅從他們為了逃出家園而將生死置諸度外的行動來看，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肯定都遭遇了使他們無法活下去的不幸，這一點已足以構成他們尋求避難的理由。至於他們在偷渡被捕後的全部遭遇，要怪恐怕也只能怪他們比當年移居北美的老資格船民來得太晚，除此以外，兩者的冒險行動並無甚麼根本的不同。不幸他們碰在美國國內反移民潮的風頭上，於是被法庭的扯皮一再拖延下去，在監獄裏一直關了將近四年。由於很多複雜的原因，美國移民局對這些來自中國的偷渡者表現了比對加勒比地區的偷渡者嚴苛得多的態度，好像與鄰近的偷渡者相比，遠道而來的就更不能容忍似的，而對於來自中國的，其不能容忍似乎還特別加上了一層上一世紀移民政策中重點排華的偏見。但代表了教會精神的普通民眾則始終堅持他們的救援行動，為陷身囹圄的中國人做了很多連他們的同胞也做不到的善行。據鄭義的專題報導〈自由鳥〉一文所記，關在約克郡那地方監獄裏的船民之所以能部分地堅持到最後，能有信心爭取獲釋，而美國政府在拖了那麼久之後終於把居留權勉強給予了他們，確實是和「金色展望」行動的努力分不開的。這是一些只有在基督教避難精神感召下才能滋生出來的愛的

行動，我忍不住要把鄭義列舉的感人事迹在下面摘抄一些：

六十三歲的唐娜女士每天清晨七時準時趕到監獄門口，為中國難民禱告十五分鐘……幾乎每一個難民都有一個固定聯繫的友愛的家庭，平日探監、教習英語，節日送花祝賀。許多人認領難民為義子……人們多次到華盛頓國會大廈前舉行抗議活動，要求釋放中國難民……律師助理丘奇把難民稱為「我的孩子」。三年多來，她為了準備辦案材料，出入監獄約一千五百次……計算機程序設計師克拉克先生蓋了新房，準備把舊房交給出獄的難民住……

「金色展望」行動的勝利是神聖的避難精神在美國的又一次勝利，它對美國政府的積極影響可以被理解為對美國立國精神的張揚。美國政府儘管有其實利的打算，但這個國家維護自由和正義的根本原則還是和上帝的慈愛有其一定的相通之處的，華盛頓總統早就向上帝祈禱：「讓這個國家提供更多更多安全慈悲的避難所給其他國家的那些不幸者們。」其實就不幸的程度而言，中美難民和「金色冒險號」船民之類的偷渡者才是最應該受到庇護的移民，遷徙和逃亡本無所謂合不合法，移民的合法與非法之分只不過取決於是否對移入國有利罷了。美國政府拒絕的偷渡者正是自由女神要接受的「貧苦、衰弱、無依和落難的人」，他們同那些著名的、有製造輿論價值的政治避難人士有着同樣神聖的避難權利，如果要讓基督徒選擇，那些既沒有甚麼專業技能，又不會產生政治影響的窮苦農民肯定更夠避難的資格，因為他們是真正的無依無靠者，

他們的出逃之路是全靠他們自己瞎闖出來的。或從中美徒步穿越熱帶密林，受到追捕，輾轉數國，才到達美國的邊境，再經過沙漠中的長途跋涉，到處躲藏，其間不知多少人在未找到庇護地之前已因疲累傷病而倒於途中。來自中國的船民則要穿越大半個地球，在海上漂流數月，拿自己的生命做尋找自由和幸運的賭注，而且還要受到偷渡集團的欺詐和盤剝。總之，他們付出的代價和他們尋求避難的勇氣，就是他們最應該得到庇護的理由。教會避難之所以神聖，就是因為庇護是它的唯一目的，它只庇護尋求避難的不幸者，其間根本不存在利害的問題。

可惜我們生存的世界仍然得受到利益的支配，被國家、民族、集團等既得利益的實體分割在重重的壁壘之下，像神聖的避難這樣基於人道立場的人權呼喚，只不過在壁壘間的僵硬磨擦中起一些潤滑作用而已。儘管如此，它畢竟在我們的世界太多令人失望的裂縫間長出了稀疏的希望之花，走投無路的人因此才有了找到活路的可能。本文之所以不避繁冗，反覆探求避難的神聖意義，就是想要點出基督教化的正義原則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價值。它仍然是西方世界的精神脊梁，作為抗衡的力量和調整的因素，它時時刻刻都在發揮着使這個世界的苦難再減少一點的作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還能有多少比減少苦難更神聖的事務呢！

**康正果**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高級講師